

地图如此之小：地理、战略与国家利益

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

本文是最初发表于查塔姆研究所月刊杂志《今日世界》中一篇文章的扩展版本。

与当代世界许多安全观点格格不入的是，全球在战略上，仍然是一个大的场所。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物质工具，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小而非很小。如果我们摒弃距离和地缘政治意义的话，我们也会抛弃连贯性战略所依赖的均衡性和谨慎。在没有空间感的情况下，用相对的眼光来考虑和归类我们的利益和活动，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如果国际主义者的超激进主义，对谨慎和克制意识造成破坏，我们很可能会过度消耗自己，并会否定大战略中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舒适的权力盈余。距离应该成为我们如何去界定利益的核心，距离会继续限制针对我们的直接威胁，相反，它也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摩擦和阻力。

“防卫一切等于没有防卫。”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这个逻辑应该引起英国的注意。英国正在进行这一代中最重要的国防政策辩论。然而，这种克制却无法引导英国的治国之术。在当前状态下，英国的官方视野因为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67—1868年和1874—1880年间两度任英国首相）的错误，而成为牺牲品。正如索尔斯伯利勋爵（Lord Salisbury）当时警告所说，迪斯雷利夸大了俄罗斯通过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对印度构成的威胁，因为他的眼光太短浅。看似很近和重要的威胁，实际上很遥远。空间是一个有形的盾牌，距离感是思考均衡性的一种方法。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认为世界更小、节奏更快和更加全球化时，美国和英国应该利用地理，来定义其国家利益的概念，并时刻做好准备。

大战略是一种实战演练。它使国家权力与其利益形成联姻，加之目标、方式和手段的配合，目的是为自己“带来”安全，并确保一种安定的生活方式。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认为，如果在这个对枯竭资源需求更加紧迫的时代，把战略比喻成一个软弱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症状在美国和英国应该会更加明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在《国家安全战略》（NSS）中是非常明显的。《国家安全战略》宣言提出了慷慨的

愿望清单，而非可衡量的利益和权力考量，并展现了英国作为良好公民的形象。宣言称，英国的安全取决于一个自由的、“基于准则的”并且坚持自己价值观的世界秩序。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深奥的概念。

在金融危机和金融疲乏时代，美国捉襟见肘的霸主地位和（就其本身而言）作为世界秩序守护者的角色，以及其安全领域的范围，几乎是没有限制的。美国承担的责任是确保全球公共领域和交通枢纽点的安全，确保几大洲驻军国或保障国的安全，扩大其威慑范围，扩大其联盟成员。在高科技资本密集形式下，要想理解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的语言，必须理解其在全球驻军的蓝图：“扩大全球防御姿态，包括为在所有地区取得成功的前沿驻扎和轮流部署联合待命部队、预置装备和海外设施，以及国际协定。”

美国和英国战略文件的统一主题并不是战略，而是全球主义和复杂性。这些文件描述了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失败国家的混乱局面可能会使英国面临诸多危险。破裂国家是极端主义、疾病或犯罪的滋生地。源于“这些地区”的危险是多种多样的：流行性疾病、武器扩散、海盗行为、气候变化或者意识形态斗争等。通过廉价旅行、快速通信、数字金融、互联网或分散网络等手段，这些危险可以抵达西方国家或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安全与其他国家的政权类型有着直接的联系，安全无法容忍狭隘的思想。因此，英国必须全盘考虑，并要采取有远见的姿态，关注、参与和干预周边事物，以保护其核心利益。

地理因素也出现在英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但对其仅仅是表面上和广义上的描述。该战略宣称，非洲至关重要，无论是极端主义存在地区，还是暴力存在的地区，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偏见的检验标准；东欧至关重要，因为英国参与其中；中东至关重要，因为该地区对安全非常重要，而且是极端分子的“图腾”，他们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国内恐怖主义存在联系。中亚、东欧、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这四个区域将使超级大国遭受极大的压力，更不用说是英国了。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定义的话，西方国家的利益就具备了开放式、去地域化和无界限的特点。因为无论何时涉及到秩序、价值观、威胁、稳定或财富问题时，西方国家的利益都会危如累卵，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英国应该首先考虑的事项。事实上，所有一切事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相互依

赖和脆弱性的最终标志是“基地”组织收买塔利班政权后，在阿富汗建立了训练营。在一个贫穷的、不起眼的遥远国家，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恐怖主义生根发芽，并在西方土地上迅速扩张。

这个世界的看法究竟有多么现实？这种建立在全球化理论上的现实，到底有多么真实？

毫无疑问，这种长期的全球化进程，因为电报和网络的发明而得以加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进程是不平衡的、局部的和可逆的。

全球化理论在经济学领域遭到抨击。怀疑论者攻击他们所见的一切是“十足的胡话”。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对他们的判断进行辩解，但整体情况却很有意思：证明相关性并不等于证明国界的取消。这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几点：

资本运作、商业和民众是先见之明的核心。然而，经济学家潘卡基·格玛沃特（Pankaj Ghemawat）试图用几个定量测试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种方式却经不起质问。首先，“超过一半的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是在区域内进行的，通常是在邻国之间发生。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是局部的，或者至少是区域性的。大部分（80%）股市投资，掌握在总部设在投资者本国的公司手中；2%的学生在祖国以外的大学就读；不超过1%的美国公司拥有海外分部。只有3%的人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地区。这并不是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比他的胸毛还要多。

更重要的是，在某些方面，100年或150年前的世界，比当今世界更具全球化。比较一下当时的移民模式，人们并不需要签证，更有可能出现庞大的移民潮。今天，我们忙着办理昂贵的旅行证件和护照，其平均成本超过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我敢说，任何前往美国（被认为是地球村的心脏）的西方人，都会把他们在海关的经历，描述为没有边界的经历。这种经历会随着历史潮流的波动而波动。与今天的六家汽车公司相比，60年前两大汽车公司的汽车产量占到全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

对全球化理论持有新的怀疑态度，还可以为当代战略提供帮助。全球化理论已经争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1944年世界大战期间，当来自欧亚大陆边缘的英国和日本军队在缅甸发生冲突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被“人们无意识地重复某些措辞的方式……”所迷惑，他写道

“两个伟大的最爱是‘无距离’和‘无国界’”。奥威尔反驳说，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收音机等现代发明的影响是加强了民族主义，并为极权主义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控制和限制了前所未有的旅行和移民，在一个科技创新步伐加快的时代，‘当用牛奶造出绒线，用石油造出橡胶时’，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便会大大减少。

对“邪恶轴心国家”直接威胁美国利益持怀疑的人认为，现代化和机械化军队的后勤需求将使穿越大西洋进入南美洲和攻击美国的反制行为变得更加困难。无论罗斯福如何警告说，地图上几英里绝对不是安全指导，华盛顿还是努力以领航员而非水手的视角，在一个无障碍的、连续不间断的单一球体上重绘世界地图。

今天，环顾我们身边，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个超越国界的、去地域化的世界？不一定。肯·布斯（Ken Booth）认为，物理空间斗争的残酷现实，正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上演着。“大肆吹嘘无边界的全球化世界，并没有消除对土地占有的最艰难斗争。多年来，发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事件，每天都在证明着这一点。边界问题影响深远。”

主权国家正在艰难地进行反击，这并不是一个人类不加批判和被动接受的必然历史进程。现在，我们目睹了最古老的领土控制和国内防御手段的回归——防卫墙。在巴格达，沿美国-墨西哥边境，以及在约旦河西岸都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航空弹药和通讯系统并没有把它们变成文物。防卫墙回归之后，安装了电子设备，从而变得更加坚固。墙的存在也意味着更深的持久性——这是控制和管理领土的政治需求。墙的存在可以是排他的，或者可以通过更巧妙的设计，用以减缓和拖延入侵。尽管未来拥有跨越国界的技术和虚拟身份，战争仍然是一个高度区域性的活动。以色列国防军震惊地发现，在其入侵黎巴嫩的行动中，敌方义无反顾地采用传统的反装甲“刺猬”防御战术，利用地形来保卫其划定的边界领土，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体验。在战乱中，“人们取得的胜利”，包括在巴格达，把整个社区强行用墙隔离开来——这标志着在平反叛乱、以及分开和隔离对立人民过程中，经典做法的回归。

就最近的行动来说，在开伯尔山口这样的地方或跨越几千英里的地方投送力量，会对我们的飞机机身和车辆造成严重磨损。远征部队——尤其是专业的高科技远征部队——部署到国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我们可以跨越

空间，但要遭受巨大的压力，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效果还不能长久保持。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曾经描述发动战争的特点就像一个人穿越海洋这种抗阻介质。对于我们作为国家警察实施巡逻的地区来说，这个特点实际上是正确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是，我们的安全与其他人并无太多的联系。因为无法确定优先考虑次序，全球主义成为了一种反战略。它存在着三个缺陷：一是它低估了距离的屏蔽效应；二是它错误地声称英国的利益与其价值观是相同的；三是它忽略了冒进型活动过强，即有可能成为解决方案，也有可能成为问题根源。

与公认意见相反的是，“911”事件并不仅仅是由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庇护营发动的。从中亚荒地，到纽约的大规模谋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911”事件的发生，依赖于第一世界的关键场所，如佛罗里达州的飞行学校和汉堡的行动基地。但对基本法执行和国土安全方面发生的偶然事件来说，这是可以避免的。正如马克·萨格曼（Marc Sageman）认为，通过国际警察工作、边境控制、数据库建设和情报交流、机场安全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地区大国的支持，新圣战恐怖主义——甚至是灾难性和远距离的恐怖主义——都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在巴基斯坦山脉和英国街道之间，可能存在着“恐怖链”，但我们可以两国之间的许多点上，干扰这种“恐怖链”。即使是激进的英国人也需要训练和资源，各国可以使其遭到破坏。远道而来的军事力量，可以用来有效干扰大型恐怖基地。然而，我们对宏伟的武装国家建设项目，还拥有折中的替代方案。否则，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不加区别的概念，即我们很容易受到失败国家的攻击；我们已经准备好武装干预苏丹、也门或者菲律宾的理由。这并不是战略，而是一幅永无休止的战争蓝图。

此外，拯救失败国家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与发展理论相反的是，宗教恐怖主义并不是第三世界苦难的产物，和平也不是现代化的孪生兄弟。大部分恐怖分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专业的世界主义者，他们在技术先进的国家，而非贫民窟里发展壮大。发源地国家的民主，在历史上是一场血腥的承诺。自由选举和自由市场是两个竞争的过程，它们往往会加快暴力冲突的发生。大多数伊斯兰恐怖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限和局部的，而不会直接威胁到英国。

对于大国敌对行为来说，距离感还可以使西方战略与中国联系起来。使欧亚大陆分开的必要性是 1917 年冲突、1941 年冲突和 1947-1989 年长期冷战发生的主要原因。发生冲突的逻辑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国家工业能力的积累，可以带来直接威胁。自那时以来，工业的发展使遥远的权力不平衡带来的直接威胁，变得更加遥远。现在，美国海上霸权的限度是前所未有的，相当于 13 支海军的标准；美国海上霸权的限度也可以用火力来衡量，相当于 20 支海军的标准。用核武器征服任何国家的代价极度昂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要具备核武库的防御性国家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打击报复能力，它甚至可以仅仅利用几次惩罚性打击，就能摧毁侵略者。核武器还会带来其他严重的威胁，因为它们无法阻止（目标不在彻底击败敌方的）有限战争或全面核交换，而且事故或误解就可以使各国濒临灾难边缘。但它们严重限制了侵略者向其他核国家扩张的能力。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卫星和信息等其他创新技术，使防御性国家拥有预先定位和远距离打击能力，使他们能够对在前沿基地采取行动的远征部队造成严重损害。这种情况不会自动击败战争开始的论点，也不能保证各国不会试图扩张。但是，在“明显及存在危险”的基础上，这些考虑因素提高了证明战争正义性的门槛。

如果我们通过那些具有远见的人的眼光，来想象一下战略生命，我们不难认识那种临近性所带来的不安全和阻力。如果中国宣布一个大同北京，中国的船只就会在我们海上周边巡逻，甚至中国会在自己的后院宣布专属区。如果中国把我们国家细分成超大型的战略司令部，我们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世界而勉强同意，这是自然的事情吗？想一想北约，如果互换一下角色，取得胜利的苏联将华沙组织扩张到我们的领域，并宣扬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必然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做出何种反应？北大西洋对旧苏联边界产生的驱动力，造成了典型的安全困境，空间和盟国不断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反作用。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又是怎样的呢？这种思想与地域限制相互矛盾。一些评论家声称，英国的价值观就是其利益所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英国的价值观和其利益之间可能存在交叉，但英国通常使两者之间达成恰到好处的妥协。英国不允许意识形态分歧阻碍与沙特或中国的联系。“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包括提前释放准军事组织囚犯和交易公正。即使在与具有进攻性的政权进行斗争时，自由国家往往求助于气度狭隘的盟友。为了击退阿根

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英国依靠智利的皮诺切特。地缘政治学并不一定是宽宏大量的敌人，但利他主义必须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拥有有限权力的英国，不可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合乎道德和积极的。

自由的干涉主义姿态和国家利益的扩张概念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国外采取行动并不一定是遏制或消除问题的谨慎方式。干涉主义鼓励他人的冒险行为，并煽动人道主义灾难。熟练的本地球员蓄意挑衅对手实施反暴行为，以引起外来干预。扩张就会带来反抗。西方国家通过考虑不周的北约东扩，来加强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会使莫斯科站到敌对的位置上，并会加剧边境地区的冲突和对抗。近距离谈判比侵占更加明智。

此时，我们应该缩小而非扩大西方国家的安全视野，并重新界定我们的领土利益。该行动的出发点，可以是其地区和腹地（西欧和中欧）及其气管（通往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如果美国的经济实力基础进一步削弱，如果亚太地区取代大西洋成为其地缘政治的重心，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动用军队的保护，将地区安全的重担转移到欧洲国家。英国将成为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世界变得更加多极化，西欧可能必须做出更大的贡献，来守卫中东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和交通枢纽点，并且对该地区石油的依赖性会更大。关注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或者空间，比从外部收拾某些国家更加有限和可行。将其利益和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一世界还必须发展新能源战略，以降低其石油消耗，使自己从拥有“暴力极端分子图腾身份”的地区中解脱出来。

我们对战略环境规模和相关性的构思，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其最终结果是，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理论和大战略强制联系在一起，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没有半球、没有中心和界限的世界。我们的切身利益将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处于联系和一体化无望的世界之中，我们因此也会变成流浪的、维持治安的警员。

如果我说得对，或者说得令人满意，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发现界定我们领土利益或排列世界各地名次，以及据此管理有限资源的规律。总之，我们决不能让散漫的全球化理论取代战略。

从自然法则和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对于我们的抱负来说，是一个过于巨大的舞台，使我们对权力的承诺，也过于巨大。从一个层面讲，对脆弱小世

界的意识增强，往往使具备力量投送能力的国家，继续保持连续激进主义和干预状态。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对小世界持有同样的想法，为那些由于其他原因支持相同的扩张外交政策的人提供了一个思想库。

这种心态会导致不和与争执。它错误地认为，军队并不是一种阻碍储备的最有价值的保障形式，而是一种像詹姆斯·福瑞斯图（James Forrestal）所说的“准战争”状态中，不断被利用的社会工程工具。

这会把资源和国家实力误解为应该不断消耗的资产，借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话，对于可靠的大战略来说，其精髓的一部分是舒适权力盈余的稳步积累。这反过来，又会损害我们对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

在这种极度活跃和自由军国主义状态下，我们无法故意装出不肯合作的样子。相反，我们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无数随手可得和推卸责任的机会，更糟的是，通过在战略上，利用他们的受迫害情结，操纵我们卷入边缘战争。

这将不太容易接受。这意味着在需要我们采取治安行动时，对支出的权力保护（这是一种强大，但不是很繁忙的武装力量）和承认混乱和威胁的意愿（这是其中最困难的），并不一定是“战场上”独立存在的事情，但它们会因为我们自己弄巧成拙的行为，而被夸大。在这种时代精神下，也许世界并不是如此之小。

帕特里克·波特是英国雷丁大学战略研究院高级讲师，英国国防参谋长战略论坛特别会员。他是在线战略新杂志《Infinity》的特约编辑，目前已经发表数篇关于战略、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文章。他还是《东方军事：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战争》（Military Orientalism: Eastern War through Western Eye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作者。他的博客网址是：<http://offshorebalancer.wordpress.com/> 和 <http://kingsofwar.org.uk/>。